



高 等 院 校 翻 译 专 业 必 读 系 列



TRANSLATION

当代语言学途径 翻译研究的新发展

语境化

陈 浪 /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高等院校翻译专业必读系列

当代语言学途径 翻译研究的新发展

——语篇·斡旋调解·语境化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语言学途径翻译研究的新发展: 语篇· 斡旋调
解· 语境化 / 陈浪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1. 4

(高等院校翻译专业必读系列)

ISBN 978-7-310-03667-7

I. ①当… II. ①陈… III. ①语言学—高等学校
—教学参考资料 ②翻译理论—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1777 号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肖占鹏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河北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9.875 印张 2 插页 248 千字

定价: 20.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序

对中国译学界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上半期也许可以算是翻译研究语言学派最为风光的时期。当时，凡是研究或讨论翻译问题的文章，几乎是言必称奈达，或是称纽马克和卡特福德。“等值”、“动态对等”等术语，成为当时中国译学界最时髦的理论话语和学术命题。之所以如此，也是可以理解的。众所周知，中国翻译界长期以来缺乏理论，上世纪五十年代前苏联翻译理论家费道罗夫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翻译理论概要》即是中国译学界奉为圭臬的唯一的理论资源。这样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我们的国家开始奉行改革开放的国策，我们的学者有机会接触西方译学界丰富的理论成果时，“西方译学研究借助现代语言学手段，注重科学的论证方法”而提出的各种翻译理论模式，首当其冲的是奈达的等值理论、卡特福德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等，自然会让久处封闭环境中的我国译学研究者眼睛为之一亮，精神为之一振。

然而曾几何时，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在国内译学界却似乎风光不再。随着上世纪末、新世纪初代表当代西方译学界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一批学者及其论著陆续介绍进来，文化学派开阔的学术视野、深厚的哲学底蕴、富于新意的学术命题，立即吸引了中国译学界，特别是中青年学者的眼球。詹姆斯·霍尔姆斯、苏珊·巴斯奈特、安德烈·勒菲弗尔、劳伦斯·韦努蒂、西奥·赫曼斯等人的名字取代了奈达、纽马克和卡特福德，多元系统论、文学解释学、接受美学、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等，取代了“等

值论”、“动态对等论”，成为了中国译学界最津津乐道的理论话语，尤其成为了中青年学者们最热衷的学术研究话题。

确实，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译论的引入及其在国内译学界的迅速走红对国内译学界产生了相当强烈的冲击。这种“冲击”一方面表现在国内译学界对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内涵和意义的误解上。譬如有学者就专门著书撰文，认为当代国外译论，尤其是文化学派的译论，尽管不无可取之处，但偏离了翻译的本体，“走向了歧路”。该学者更进一步具体指出，“尤其是解构（deconstruction）学派、女权学派、操纵学派，更是代表了这一错误方向”。¹还有的学者把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理解为是“文化研究对翻译本体研究的剥夺”：“……应警惕用文化研究取代语言研究，即文化研究对翻译本体研究的剥夺，把翻译本体研究消解在文化研究中”。²

另一方面，这种“冲击”也同样表现在国内译学界对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新一代语言学派译论，或者用本书作者的说法，即“语言学途径翻译研究”的认识隔阂与误解上。譬如国内至今仍有不少研究者在提到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时，心中想到的仍只是以奈达为代表的那一代学者及其传统语言学派的观点，并据此把语言学途径的翻译研究简单地等同于在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照下对翻译过程的语言系统对比研究，理解成为实现译文“等值”或“对等”的方法的研究，等等。

上述背景表明，国内译学界在围绕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派研究与文化学派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显然还存在着一定的认识误区。而产生这一认识误区的根源之一即是对当代西方语言学途径翻译研究的理论内涵和最新进展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

1 赵彦春. 翻译学归结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2-3.

2 吕俊、侯向群. 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视角[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识。这正如本书作者陈浪博士指出的：“随着翻译界更多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开拓和引入，人们对该途径翻译研究的关注和探讨不比当年。个中原因复杂，就普通翻译爱好者或学生而言，也许是因为他们对西方语言学途径翻译研究的现状还不够了解，甚至有些误解。而在学术界，人们对语言学途径的翻译研究也普遍缺乏更深层次上的思考。”正是有鉴于此，陈浪博士撰写了这本题为《当代语言学途径翻译研究的新发展——语篇·斡旋调解·语境化》的专著，希望通过本书与读者共同探讨一下：这一研究途径新发展的学术价值到底是什么，语言学途径究竟解决了哪些文艺学、文学、文化研究不能解决的问题，它对我们的翻译研究、翻译实践等的积极意义和启发是什么，而它自身又有何局限，与其他途径相比，它有哪些问题不能解决，等等。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本书鲜明的问题意识以及与国内学术文化语境紧密相关的现实意义。

本书作者敏锐地觉察到，当前翻译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翻译学的研究领域“已沿着脱离‘如何译’的技术问题的轨迹，而向那些将翻译视为社会活动、探讨译本的性质和功能以及翻译产品的文化影响方向发展。正如文化学派的研究并非是脱离文本的宏观研究一样，语言学派的研究也不是人们误解的仅静止关注文本内部的研究。翻译学研究的对象不但涵盖翻译行为，还包括制约翻译行为的各种动因以及翻译行为对产生语境的反动因素，而不仅仅是一个个孤立的翻译产品”。这一“发现”应该可以带给国内译学界诸多启迪。

而不无必要强调指出的是，上述结论并非作者的信口开河、主观想象，而是建立在作者大量的第一手外文资料的基础上的，建立在作者细心研读、认真领悟原作精神的基础上的，建立在作者依据大量事实缜密推理的基础上的。本书表明，作者认真研读了贝克、梅森、哈蒂姆、豪斯、肯尼、谢夫娜、芒迪等一批当代西方新一代翻译研究语言学派学者的相关论著，对他们的翻译思

想、基本观点、研究方法及方法论特征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和分析，从而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当代西方语言学途径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揭示了该途径新发展的哲学思想渊源，点明了语言学途径研究对翻译学学科建设发展的独特作用。

本书还表现出相当的前瞻性。作者在本书的结尾部分明确指出：“翻译研究领域两大主流研究途径，即文化学途径和语言学途径，发展到今天，已在翻译定义、翻译规范、译本的规则格式、翻译伦理等领域达成不少共识，但在理论的重合之处并非完全相同，因为各自的理论来源和方法论视角是不大相同的。尽管如此，在采取批判的态度来研究翻译现象的立场上，语言学途径与文化翻译研究越来越倾向于一致。一些具有强烈当代意识的翻译课题被不同途径的学者共同讨论和关注，譬如意识形态、翻译伦理等问题。这些或许表明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某种合流的趋势。无论今后译学研究发展是否如此，我们都应该关注译学界不同研究途径之间的对话和争论，并由此考察翻译学发展的持续动力。”这样的分析还是很有见地的。

细心的读者当能发现，本书作者在书中很少使用“语言学派”这一术语，而代之以“语言学途径翻译研究”或“语言学导向的翻译研究”等表述。这是因为作者觉得在西方译学界人们较少使用“语言学派”或“文化学派”这样的术语，所以她也尽量避免使用。通过这一件小事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严谨、谨慎的学风。对此，我一方面当然表示肯定和赞赏，但另一方面，就“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这两个具体术语而言，我又觉得她有点过分小心谨慎了。因为在这两个术语已经被国内译学界广泛接受和使用的情况下，避而不用这两个术语，有时反而会给我们的讨论带来不便。当然，这也仅是我的一家之言，仅供作者参考而已。

本书实际上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充实、修改而成的。作者陈浪是我在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建立了中国内地第

一个独立的翻译学博士点之后招收的第一批两个博士生中的一个。与我此前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学位点招收的大都具有较浓厚的文学背景的博士生不同，她具有相当鲜明的语言学学科背景。她曾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就应用语言学和教学法项目访学进修了一年，对当代语言学学科的最新发展相当熟悉。因此，在酝酿博士论文开题报告时她征求我的意见，表示想把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语言学途径翻译研究的最新发展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我当即表示支持。尽管我本人的研究重点是文化学派的译论，也尽管我本人对语言学派的译论的最新发展并不熟悉，但我从我本人的研究实践中感觉到，要全面把握当代西方译论的走向，语言学派译论是不可或缺的一块。而最近一二十年来，国内译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陈浪没有让我们失望，她的博士论文在答辩时获得了评委们一致的高度评价，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翻译研究领域对当代西方语言学派译论研究的不足。我相信，在这篇优秀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充实、修改而成的这本专著的正式出版，必将为当代国内译学理论的发展和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是为序。

谢天振

2011年2月

前 言

翻译的理论研究对于翻译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对有代表性的主流译论进行系统的梳理、分析和探讨,不但可以加强翻译学理论基础的建设,对翻译学学科的建设也大有裨益。

本书所关注的目标正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语言学途径翻译研究。这一主流译论的出现不但开创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理论层面,为后来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它在 20 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引介更为中国译学研究带来方法论上的革新,使人们在中国传统译论之外看到了一片新天地。不过,随着翻译界更多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开拓和引入,人们对该途径翻译研究的关注和探讨不比当年,对其研究也普遍缺乏深层次上的思考。而实际上语言学途径的翻译研究如今仍持续繁荣,并不断为翻译学的发展开创新的思路源泉。近 20 年来,语言学导向的译学研究与文化学途径研究一样,也注意到一些共同的翻译课题,如对意识形态、翻译伦理、规范以及对翻译研究方法论的关注,只是各自的切入点和研究方法相异。正如文化学派的研究并非完全脱离文本的宏观研究一样,语言学派的研究也不是人们误解的仅静止关注文本内部的语言研究。

那么这一研究途径新发展的学术价值到底是什么?语言学途径究竟解决了哪些文艺学、文学、文化研究不能解决的问题?它对我们的翻译研究、翻译实践等的积极意义和启发是什么?针对这些问题,本书以元理论研究的角度对 20 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方语言学途径翻译研究做一个全面并有重点的解读与评价。本书展

现该途径研究背景的学者在译学研究上的不倦探索，同时也在哲学、语言学和翻译学等学科发展的时空变化之中考察其理论背景、概念体系、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应用范围，系统探讨该途径的理论趋向和实质，以语境化研究的方式勾勒该途径多年来发展的谱系特征图，使读者得以一叶而知秋，对当代翻译学的发展有清晰的把握。本书同时也希望国内研究者将西方译论发展中发现的问题转化为自己的正面课题来研究，从中国译学研究现实出发，最终得出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成果，推动我国译学研究的发展。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本书将以文本细读和理论阐发的方式对经典理论文献进行定性分析，同时综合多维的历史描述框架对该途径理论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展开历时和共时的批判性分析，既将当前语言学途径主流研究的思想概念和手段与早期语言学派研究的方法、理念进行对比，同时也注意对当代语言学途径与同时代的其他途径思想概念和手段做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不同学术背景的译学学者在某些重要概念的理解和在理论工具使用上的异同。

本书具体研究的思路为：1) 从国内外文献考察这个流派本身的兴起和发展变化的事实，反思译学界对这一途径已有的评价；2) 从社会动因和学术动因的角度来考察这一途径新发展的变化轨迹；3) 从范式入手来看这一途径发展的标志特征。因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次表现出来，所以本书将重点考察和分析该途径新发展的哲学思想渊源以及代表性学者在语言观和翻译观以及方法论方面的论述，尤其是一些常用术语的论证和分析。我们认为某些概念几乎贯穿了整个译学研究过程，只是它在不同研究中的性质、内涵和所指均有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集中反映了不同时期人们对翻译的相异理解和观念转变。对这些概念的细致考察有助于深入理解语言学导向翻译研究在观念和方法论上的转变，并促进我们思考采用更恰当的元语言

工具来描写和解释翻译过程。

在研究内容上,本书专注于解决以下几个具体的问题:1)历时地描述语言学途径翻译理论的兴起与发展轨迹,重点介绍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领域代表性学者的成就,使读者对该途径理论思想的产生和最新发展有清晰的了解;2)勾勒当今语言学途径翻译研究的概念体系,探讨其理论特征和学术价值;3)总结语言学途径翻译理论的成就和自身不足,发现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把握翻译学学科的未来走向。

本书认为,一方面,语言学在翻译学发展过程中不断为其提供理论与方法等研究资源,另一方面,当前的翻译研究成果也给中外语言学家不少启示和借鉴,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和巩固了翻译学学科定位。其次,尽管语言学途径译学研究始终立足于文本语言的分析和解释,但在其发展的50年间,理论来源类型、研究对象、目的和方式都发生了一定变化。目前,语言分析在翻译研究中变得日益重要,但这是以语言结构的特征分析与更宏大的超越语言层面的研究目的结合为前提下取得的结果。近20年来语言学途径翻译研究的新发展表明,在采取批判性态度研究翻译现象的立场上,语言学途径与其他途径如文化学翻译研究越来越倾向于一致。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翻译学研究今后将语言分析与文化分析结合进行的综合研究趋势。在此基础上,翻译学学科有可能形成自己整合的、与其他学科有显著区别的研究方式。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1.1 认识误区：“等值”研究还是其他？	2
1.2 国内外针对语言学途径翻译研究的评价	5
1.3 重新认识语言学途径翻译研究	9
第二章 语言学途径翻译研究的历史回顾	14
2.1 什么是语言学派？	14
2.2 现代译学理论的诞生	17
2.3 早期语言学途径研究的范式危机	35
2.4 并未消亡的语言学途径	42
第三章 语言学途径翻译研究的新发展	44
3.1 语篇与翻译：功能与语用翻译研究	44
3.2 语言变体与翻译：语料库翻译研究	71
3.3 译者行为与翻译：批评性翻译研究	99
第四章 语言学途径翻译研究转变的动因	118
4.1 语言学领域：“语言—言语—话语”的研究转变	118
4.2 翻译学领域：“源文导向—译文导向—译者导向” 的研究转变	147
4.3 语言学途径翻译研究：范式更迭与自身批判	161
第五章 语言学途径研究新发展的理论趋向和实质	185
5.1 语言学研究途径新发展的哲学渊源	186

5.2 语言学研究途径概念体系的发展	194
5.3 语言学研究途径研究方法的改进	229
5.4 语言学研究途径研究用途的拓展	242
第六章 当代语言学途径翻译研究新发展的启示	249
6.1 从新发展认识语言学途径研究的历时变化	249
6.2 从新发展重识语言学途径研究的价值	253
6.3 从新发展把握翻译学研究前景	258
参考文献	261
附录：理论术语表	291
后记	300

第一章 绪 论

相对于其他一些途径的现代译学研究而言, 翻译的语言学途径研究¹在国内更早广为人知。20 世纪八十年代初, Eugene Nida 等国外语言学派译论家的思想经过译介引入我国译学研究界, 使人们在中国传统译论之外看到了一片新天地, 促进了当时中国译学研究向理论化发展。然而, 随着翻译界更多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开拓和引入, 人们对该途径翻译研究的关注和探讨不比当年。个中原因复杂, 就普通翻译爱好者或学生而言, 也许是因为他们对西方语言学途径翻译研究的现状还不够了解, 甚至还有些误解。而在学术界, 人们对语言学途径的翻译研究也普遍缺乏更深层次上的思考, 如这一研究途径新发展的学术价值到底是什么, 语言学途径究竟解决了哪些文艺学、文学、文化研究不能解决的问题, 它对我们的翻译研究、翻译实践等的积极意义和启发是什么, 而它自身又有何局限, 与其他途径相比, 它有哪些问题不能解决, 等等。

本书试图回答以上问题, 弥补这方面探讨研究的不足: 拟从 Hermans (2002: 21) 所说的二级观察 (second-order observation)²的角度, 即从元理论层面来对 20 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语言学途径的翻

1 本书中出现的“语言学途径研究”、“语言学导向译学研究”以及“语言学派研究”等术语均指同一类研究。

2 Hermans (1999, 2002) 借用 Niklas Luhmann (1993) 的“二级观察”概念, 说明翻译研究中学者们“对观察的观察”的研究方式。翻译研究者观察翻译现象并进行分析, 这是一级观察活动, 而对一级观察活动进行的考察, 即研究一级观察者如何观察研究对象等问题, 则属于二级观察活动。Hermans 同意 Luhmann 的观点, 认为二级观察是一种解构主义实践。

译研究成果进行深度剖析，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入手重点考察该途径研究的新进展，揭示该途径新发展的哲学思想渊源，勾勒其基本概念体系，探讨语言学途径研究的适用范围及其对翻译学学科发展的独特作用。

1.1 认识误区：“等值”研究还是其他？

在国内，片面认识语言学导向的研究并不是由于译学界全面否定该途径研究的价值引起的。人们大多赞同语言学对语言现象的系统描述和解释给予翻译研究有益的启示。学者们也非常肯定语言学导向的翻译研究对促进翻译学学科意识萌芽的贡献，认为“以语言学研究途径的翻译研究赋予翻译研究科学的性质”（许钧 2003：17-18），“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史上的理论层面”（谢天振 2003：13-14）。事实上，自 20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金堤、谭载喜、穆雷等国内学者的引介，Nida 等传统语言学派学者的思想在国内广为人知，影响很大。2000 年在香港出版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就指出“在（国内）已翻译出版的西方译论专著之中，语言学派占了大部分”。究其原因，大概是“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以指导实践为目的，强调‘对等’，这与中国的传统译论，都属于以‘忠实’为目标的‘应用翻译学’，因此容易被接受”（陈德鸿、张南峰 2000：ix）。而此书中所说的“语言学派”指的就是 Catford, Nida, Newmark 等一批主张“等值/对等”探讨的传统语言学译论家。

不过，也正是由于这批学者的思想广为人知，很多国人无论诟病或是推崇，一提到语言学派，就会言必称 Nida, Newmark 等人。实际上，语言学派十几年来随着语言学译论的新发展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外以语言学范式为背景的重要翻译理论家如 Baker, Hatim, Mason, House, Schäffner 等人已经尝试借鉴语言

学的特定分支或特定的语言理论,如系统功能语法、语用学、认知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社会语言学等,关注翻译中的语言实际运用情况,并将非语言因素纳入研究的视野,创建了关于翻译的描写、评估或教学的模式。他们的研究早已超越了语言学派初期那种文本对比分析和纯粹规约性实践研究,在探讨翻译语篇机制问题的同时也揭示文本外的世界观、意识形态或权力运作对翻译过程和行为的影响。但国内有些研究因为只盯着传统语言学派的观点,将语言学导向的译学研究简单等同于在结构主义语言观照下对翻译过程的语言系统对比研究,这就难免出现整体上的认识偏差,得出诸如“现代语言学理论必然为翻译研究带来空白”的偏颇结论(张柏然、辛红娟 2005: 506)。

将语言学途径翻译研究简单理解成实现译文“等值”或“对等”的方法的研究,这样的观点还可以从一些学者对翻译性质和翻译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中得以瞥见。有学者认为,在翻译本体性研究中,语言派的研究“让位于文化派而成为自处边缘的‘二级’理论”“颇令人惋惜”,因为“翻译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忠实’和‘对等’的核心地位”,而“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本是翻译的干扰分子,在文化派那里却扮演了翻译的主角,使‘不译’(指摆布式的创造)成了‘译’(指译学)的主流”(赵彦春 2003: 74; 71)。姑且不论这样的论断是否误解了文化学派的译学研究,是否混淆了描述性研究和规约式研究、翻译对象和翻译研究对象的区别,它实质上已否定了近年来语言学派研究中一些具有强烈当代意识的翻译课题,暗示语言学派的研究忽视语言、思维、文化的互动,是不关注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而仅仅着眼于“忠实”和“对等”的语际转换研究。

事实上,近年来语言学导向的研究与文化学途径研究一样,都注意到一些共同的翻译课题,如对意识形态、翻译伦理、规范以及对翻译研究方法论的关注。语言学途径的研究学者如 Mason

(1994)曾从社会文化现象被词汇化和语法化的现象探讨翻译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而 Hatim (1999) 针对 Venuti (1995, 1998) 的意识形态研究提出语言学方法的论证；Harvey (1998) 采用批评语言学和礼貌语用理论等方法把文本具体效果与不同国家同性恋文化差异联系起来，等等。2000 年，学者们还从不同的研究阵营角度出发总结归纳过 30 个共同感兴趣的研究主题（见 Chesterman & Arrojo 2000）。这些研究都已表明“许多研究者的兴趣焦点已转向文化内翻译产品和过程的功能问题”（Tymoczko 2006: 444-445）。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翻译学领域已沿着脱离如何译的技术问题的轨迹向那些将翻译视为社会活动、探讨译本的性质和功能以及翻译产品的文化影响方向发展。正如文化学派的研究并非是脱离文本的宏观研究一样，语言学派的研究也不是人们误解的仅静止关注文本内部的研究。翻译学研究的对象不但涵盖翻译行为，还包括制约翻译行为的各种动因以及翻译行为对产生语境的反动因素，而不仅仅是一个个孤立的翻译产品。

造成这类片面的看法有多种原因。原因之一可能是国内译学界对语言学途径研究的介绍和分析存在某种程度的缺失。尽管已有不少文章具体介绍了国外语言学途径学者采用语篇分析、语料库与话语研究结合的研究实例，然而很多涉及译学流派介绍和译学研究概况的研究未能及时注意该领域的新进展，不利于人们全面把握翻译学学科的发展状况。其次，国内译学界对语言学途径研究的认识不足也有可能是受目前对西方翻译理论引介热点的影响。21 世纪以来，大量文化学导向的译论著作被引进和翻译出版，原版大多在 20 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出版，彼时西方译学界许多学者都曾对语言学导向的传统研究提出过质疑和批判，如 Bassnett 和 Lefevere 就批评过语言学导向学者固守“若知变化，必先见林不可见树”的立场以及他们对“对等”的迷恋（Bassnett & Lefevere 1990: 3-4）；而主张综合论的德国学者 Snell-Hornby